

凝 视 之 爱

——福柯医学历史哲学论稿

L'Amour du Regard

Essai d'une philosophie de l'histoire médicale chez Foucault

于奇智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凝视之爱:福柯医学历史哲学论稿/于奇智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ISBN 7 - 80109 - 554 - 5

. 凝...

. 于...

. 医学哲学:历史哲学

. R - 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0215 号

凝视之爱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66521152(编辑部) 66171396(发行部)

E m a i l: edit@cctpbook .com

h t t p:// www .cctp .com .cn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160 千字

印 张:8

版 次:2002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5.50 元

题 记

求知是人类的本性。我们乐于使用我们的感觉就是一个说明；即使并无实用，人们总爱好感觉，而在诸感觉中，尤重视觉。无论我们将有所作为，或竟是无所作为，较之其它感觉，我们都特爱观看。理由是：能使我们识知事物，并显明事物之间的许多差别，此于五官之中，以得于视觉者为多。

——亚里士多德

凝视是眼睛的天职。人类求知起于感觉，尤其是视觉。医生大胆将视诊(凝视)奉为诊断之首，永恒而执着地追寻凝视的秘密，在没有认识病体本质之前，绝不轻言放弃凝视。这便是柏拉图爱恋，即爱智的真义。因此，医生本质上就是爱神“厄洛斯”(Eros)，就是哲学家或哲人医学家。人智慧地凝视着。

——作 者

内 容 提 要

1. 病体吸引医生的目光, 医生对不同病体进行空间分析和医学分类。医学与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制度、措施具有密切关系。社会和政府必须保护医学、医学家和医生。

2. 流行病对社会和人类产生重大影响, 医学与各级政府机构必须结合, 政府必须采取措施控制流行病、瘟疫。医学空间与社会空间是同构的。医生对疾病承担监控和防治使命, 为在社会上普及和运用医学创造条件。

3. 家庭是病人康复的最佳场所。医院是否可以缺少? 医生如何才能开业? 疾病—贫困—苦难—救助问题。

4. 书面传授与口头传授有何意义? 临床医学在何处形成? 临床教学是否必须与医院相结合。

5. 如何才能有效打击江湖医生? 如何解决正规医生稀缺难题? 法国政府是如何做的? 医生的使命是什么? 医生何为? 病人与医生、医学、医院、社会的关系如何? 医事制度与医学发展的关系怎样? 福柯思想对医学社会领域有何价值?

6. 医生灵性而智慧的眼睛认识和支配一切。临床医学对凝视能力有着严格要求, 医生必须进入可见性深层结构。知识代码(征候语言结构与病例随机结构)把疾病场与凝视结合起来。临床医学在观察中发现的特权就是纯粹凝视和用逻辑组织

起来的凝视特权。观察与经验间具有何种关系？临床医学同时指向医院与医学院，观看自然在这两大场所发挥作用。

7. 尸体承载着生命和疾病的全部秘密，它使病理解剖学获得了优先意义，改变了死亡与疾病旧有的因果关系，改变了认识生命的方向。尸体使解剖学与临床医学走向结合或配置，一门病理解剖学因此诞生。剖尸或病理解剖学把凝视引向极致，医生可以尽情尽兴地观看，人类在接近疾病真理的道路上大大地前进了一步。病理解剖学的诞生标志着医学大断裂的形成，医学革命成为一切科学革命的典范。

8. 真理因私隐而不可见，秘密则因公开而可见。

9. 死亡把医学凝视引向了疾病的空间存在形式。

序

叶秀山

我认识奇智已有多年。他先学逻辑,后留学法国,研究当代法国哲学,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题目都是关于福柯的,当时我也正在了解法国哲学的情况,对他的工作很感兴趣,从此他就经常给我寄有关的新材料,直到回国工作以后,仍然给我不少帮助,可惜我的兴趣杂,对于这些材料,尚未好好研读。

我也关注过福柯,当然没有奇智那样专门,只是想从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上理出一点线索,找到他在这个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了解得就相当粗略。现在奇智的书《凝视之爱》即将出版,嘱我写几句,却之不恭。

福柯的思想和上个世纪的法国哲学文化背景有密切的关系。他是把那时诸家提出的问题集中起来,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加以阐述发扬,使一些原不在哲学视野里的问题进入哲学,突出起来,这是他对于哲学思考一个很大的贡献。

法国哲学又是整个欧洲哲学的一个方面,而自从近代以来,欧洲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主要想做的一件事是要在“哲学—形而上学”中,为“感觉经验”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以抵制怀疑论的摧毁性影响:如果你哲学只是一些“(逻辑)形式”,无补(不增加、不补充)知识,则哲学活该寿终正寝。所以,从某个角度来

说,近代欧洲哲学诸家,都是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把感觉经验的材料吸收到哲学(的体系)中来,培根如此,笛卡尔如此,康德、黑格尔又何尝不是如此。

康德、黑格尔的哲学非常抽象,为什么也可以理解为要把“经验”安置在“哲学”里?

其实,康德在哲学上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就是要“改造”传统的“形式逻辑”,使之有“内容”。他的知识论,就是通过“时空”和“范畴”来“规整”感觉经验”的材料,使之成为“知识王国—科学王国”的“份子”。康德的意思是说,凡是“合法”进入—移(民)入”这个王国的,都必得遵守这个王国的法律——不依赖这些“份子”而制定的“先天法则”。“知识王国”是一个“必然王国”。

表面上看,康德给“感觉经验”在哲学知识论里找到了一个位置——为理性形式提供“恰当—合法”的“材料”和“内容”,但是实际上,“感觉经验”还是在“打擦边球”,没有进入哲学的核心。康德哲学的核心不是“自然”,而是“自由”。“自由”才是“理性”的核心本质,而“自由”不能“直观”。于是,“可直观”的“不自由”(必然的),而“自由的”“不可直观”;也就是说,“理智”不能“直观”,“直观”没有“理智”。

为了使“感觉经验”也具有“自由”性,堂而皇之地进入哲学核心,费希特直接从康德的“自由”出发,指出所谓“感觉经验”原本不是“外来户”,不是从外面“移民”进“理性”来的,而是从“理性”外放—外化”出去的。这就是他的“A是A”=“A不是非A”的基本含义。“非A”同出于“A”,“非(不是)理性”的“感觉经验”同出于“理性”。于是就有谢林的“同一哲学”和“绝对哲学”——“理性(A)”本“无对”,其“对(立)”是“理性”自身“设定—创造—开显”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直观”原出自“理

性”，故“理智的直观”——“直观的理智”不但具有“合法性”，而且成了哲学的“第一原理”。

从此以后，欧洲的哲学传统，不能绕开这个“理智”和“直观”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说，“感觉经验”的世界，如何在理性的哲学世界生根的问题，亦即，作为理性思想体系的哲学，如何具有“现实性”的问题。

影响了整整上个世纪的胡塞尔的“现象学”，其核心思想正是抓住了“理智直观——直观理智”的“直接”的“同一性”，在哲学领域里，充分接纳了“心理（psyche）学”问题。他的学生海德格尔，把这种“同一性”运用到“存在论”上来，使“存在（Sein）”既非经验的“诸存在者”，更非一个抽象概念，从而强调了“存在”的“时间性”，使“在”与“变”在哲学层面“同一”。

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对当代法国哲学的影响是无可否认的，而经过法国自身哲学和文化洗礼之后，现象学和海德格尔思想在法国开显了另一种局面。

在欧洲，法国文化介乎德国和意大利之间，兼有同时注重理性和感性的长处，这样，在哲学上，相对于德国哲学的森严的逻辑体系来，就显得“感性”多了。法兰西民族是一个多才多艺、天性活泼的民族，当然他们也好学深思，而他们的思想，好参与生活，对于各种社会文化问题有浓厚的兴趣，法国是一个在文化上很前卫的国家。法国的哲学也不例外。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法国关注黑格尔的哲学胜于德国本土，但是他们不大从“概念”和“普遍性”方面来强调“绝对”，而是强调它的独一无二性，强调它的“个体性（individuality）”；他们很重视胡塞尔的现象学，而首先介绍的是他的“感性直观”的思想；他们研究介绍海德格尔，但是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有自己的特

点,不被海德格尔本人认同而毫不影响它的价值,萨特开发了“意识—心理”这个度,为海德格尔所欠缺;他们与海德格尔的学生伽达默尔对话,但是利科的解释学与伽达默尔的有不同的精神旨趣。

总之,法国诸家,投入大量的精力于显示感性世界的研究,以确立这个世界在哲学理论体系中的恰当—合法的地位。他们一方面直接参与生活,另一方面注重吸取各种经验科学的研究成果,对它们做哲学的阐述。像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及以语言学、社会学、民俗学为基础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还有文学艺术部门的种种思想,无不在他们的视野之中。

法国哲学不仅在纵的方面贯通着欧洲的哲学史,而且在横的方面贯串着各个相关学科。

在这方面,福柯又是很特别的一个。

福柯研究思想侧重在“断(代)”方面,将“时间”化为“空间”。因为柏格森已经说了,“时间”不可分割,乃是一个“内在”的“绵延”,而我们通常所谓的“连续”的“思想史”,实际上已是“切断”了的东西,于是,与其人为地(模拟“因果律”)把它们“串连”起来,不如如实地考察它们在各个“断层”的实际意义。所以福柯有“知识考古学”之说,据说还要写“道德考古学”,未果。其实他所谓的“考古层”并非只是“知识”和“道德”,同一层面,涵盖了一切实际的和精神文化的产品。

果然,福柯的“考古层”,不仅覆盖了人们正常的精神文化,还囊括了人们“非常”的精神文化现象,如疾病、犯罪、疯狂等等,这些过去很少能登哲学大雅之堂的问题,成了他研究思考的重点。

奇智的书,研究福柯关于疾病的思想,从“凝视”入手,“看”

出一种“征候”，而不仅仅是自然科学研究的“感觉”。在这个意义上，“看—凝视”是“理智”的，不仅是“眼睛”在“看”，而且是“心”在“看”，正是所谓“理智的直观”。

西方哲学有“看”的传统。“看”是“理智”的，故是“空间”的，来自于古代希腊的 *eidos*；中国的传统医学，也有“望闻问切”之说。“望”是初步的，也是最基础的。“望”，不仅仅是“生理”的“感觉”，而且是“理智性”的，“望”出病人的“气色”；然后是“倾听”病人的“诉说”，然后是“交谈—问答”，最后才是生理机制的检查——切—号脉。大概说来，“望”是“空间”的，“闻（听）”是“时间”的。“望”如果只“看”（生理）结构，则陷于“同一”，如“方圆”、“色泽”等；“闻”如果只限在表面，则容易限于“主观”。病人自己的诉说，不一定准确。如果“闻”而又客观，“望”而又有“个性”，则不待“问”、“切”就可能有相当准确的判断，就会得到“真知识—真理”。于是求“真知”需得将“空间”和“时间”结合起来，使“时间”是“空间的时间”，使“空间”是“时间的空间”。

福柯强调“空间”而又不强调“同一”，正是因为他所理解的“空间”乃是“时间化了的”空间，所以是“考古学”的，而不单纯是“几何学”的。“考古学”的“断层”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几何图形，是个性的，时代的，不是抽象的“普适的人性”。福柯的“空间—考古断层”，是“异”，不是“同”，或者说，是“同”中之“异”，“异”中之“同”。

把空间作为时间的“断裂”层来考虑，打破了“思想”自身延续的封闭系统，使“思想史”有一个坚实的“现实—实践—社会—时代”的基础。我们从奇智的书中可以看到，福柯在各个断裂的层面上，对于疾病（以及犯罪、疯狂等现象），做了深入的考察，从而在哲学上，从更高层次恢复古代希腊的“看”的意义。由海德

格尔强调“听”、“说”、“语言”，重新回到“看—视”的道路上，这是福柯以及法国其他诸公为我们提供的宝贵经验。

这是我读奇智的书的一点感想。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

2002年4月10日

前 言

今天,我们应当重视福柯早期之作《临床医学的诞生》,如同看好其别的产品一样。福柯在本书中所做的工作对他的整个考古学理念的进一步确立具有奠基性意义。本书揭示了医学认识论领域与别的领域间的关系,即论说(discours)领域与非论说领域之间的关系,这就是福柯所揭示的纵向度(即竖轴线),亦即对18世纪末临床医学出现的条件和效力同时进行认识论分析和政治学分析,也就是寻找医学知识与医学权力或医学知识与医学社会领域(医事管理—医学教育制度)间的互联性。可见,这两种分析是粘合的,而不是统一的,不可互相归约。这一探索道路贯穿了福柯整个思想历程,在70年代,他致力于思考权力与规范知识之间关系的缓慢建立,而医学恰恰处于这种思考的交叉口。《求知意志》(1976)、《反常》(1975)和《必须保卫社会》(1976年法兰西学院讲座),使他对医学问题的沉思跃上了新的台阶。他把医学与生命权力(bio - pouvoir)或生命政治(bio politique)观念(指向生命的权力工艺学)紧贴在一起,正是以“生命权力”这一基本概念追问了身体、人类、性(别、欲)与种族。晚期的《快感的享用》、《自我的关切》以及未刊手稿《肉体的供词》集中关注古代医学,并对主体化实践和主体化过程进行了深入研究。

《临床医学的诞生》与《古典时代癫狂的历史》同处于这条轴线。论说领域与非论说领域恰恰是某一科学对象得以构成的条件。这种条件就是《临床医学的诞生》与《古典时代癫狂的历史》的分析任务。福柯试图指出从社会内部直接获得的意义如何作为科学对象构成的必要条件出现,必须把若干条件汇集起来以使经验(如凝视或视诊、疾病、死亡等)在一定实践过程中成为科学知识的对象,而且自身也与这种经验共同构成科学知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临床医学的诞生》的中心主题是一门知识与社会、经济、政治、历史诸种条件及其变化规则之间可能存在的兼化(兼收—融化)配置关系——福柯把这一中心主题落实到“空间”、“语言”、“死亡”和“凝视”四个方面——这门知识正是在这些条件和规则下逐渐生成的。《词与物》则绕开了这一纵向度,专注于横向度(横轴线):同一时代的几门不同知识之间的兼化配置关系,即一条几个论说领域之间共同的理论模式轴线。这两条描述轴线互相垂直交汇。纵向度展现的是论说外互联性或相依性,横向度显示的是论说间互联性或相依性,也许还存在第三向度,即论说内互联性或相依性,它超出了前两者,体现了同一论说系统或同一门知识内部各要素间的关系(如《知识考古学》所为)。可见,我们获得了三种互联性:外互联性、间互联性和内互联性。因为论说与陈述(*énoncé* 或 *énonciation*)、档案、遗迹、文物、知识(*savoir*)、科学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所以这些互联性同样适用于它们。互联性与论说、陈述等要素的配置构成福柯所揭示的相关图式或相依图式(*schémas de dépendance*)。相关图式表明其组成要素服从依赖规则,彼此不同而又相互链接,互为支点、基础或根据。

《临床医学的诞生》就是福柯对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医

学史进行研究所获得的成果,和《古典时代癫狂的历史》一样,本书面对的也是非常特殊的材料(特殊领域:疾病—死亡),当时关于该领域的科学论说还相当薄弱,相反,这种论说的制度—社会—经济环境显得十分重要。诊治病人和诊治方式都依赖于社会结构与经济条件(诸如失业、劳动力需求等)。可见,医学的科学结构与它所依赖的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知识(内窗系统)与权力(外窗系统)间的关系。在福柯看来,知识与权力间具有密切联系,但这并不表明它们是完全同一或混在一起的——知识并不是权力也不是权力的面具,换句话说,科学结构不是社会结构的面具——当然,福柯试图指出,作为一切别的科学增长的医学基础的病理解剖学知识是如何在医疗机构里发展起来的,因此,不同知识形式与权力机构、制度形式(精神病院关进与医院收进)之间密切相关,我们可以在它们之间建立一些条件联系(relations de conditions),而非因果联系,更不是同一关系。正是它们之间的这种条件联系成为临床医学诞生的可能性条件或临床医学的出身—源头。一切都是源头的产物,科学知识也是如此。

尽管福柯本人视《临床医学的诞生》为一部严格的科学史沉思著作,但和《古典时代癫狂的历史》一样,出版后没有立即引起什么反响,因为癫狂、健康、疾病等问题还不是法国当时重要的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他把它们置于身旁而专注于《词与物》的写作,这本书研究的是18至19世纪的经验科学及其纯理论变化,实是前两部著作的继续和扩展。时至1968年,癫狂、健康、疾病、性欲、肉体问题突然上升为政治忧思问题。于是,《古典时代癫狂的历史》、《临床医学的诞生》显示出了巨大价值而成为畅销书,《词与物》的成功无疑起了推动作用。这也充分说明,学术

的非学术环境或著作的非著作条件对学术的生成和发展是十分重要的,实际上,这正体现了论说与非论说所具有的密切联系(互联性)。学术(著作)必然在非学术(非著作)的背景下才能获得其成功的机遇。这种学术外互联性往往为人们所忽略。

诊治档案属于语言系列,其形式—实体(疾病)是言谈(dire)的产物,即已说出物或已写出物,也就是论说体系或陈述体系。因为福柯将言语(parole)的功能区分为注释与论说,并赋予论说分析以至至上性,所以,准确地说,历史学研究的“诊治文献(医学文献)”成为考古学的“诊治档案”,是论说(discours)或陈述(énoncé)的产物,即已说出物(存在)。福柯把“言谈(Dire)”区分为“所以谓(ce qui est dit)”和“所谓(ce qu'on dit)”两个基本方面。“所以谓”是说出来的话、名、词、名称、共相、抽象,“所谓”是人们所说的对象、实、物、存在、殊相、具体。“所以谓(词)”表示“所谓(物)”。这一区分为我们从哲学上挂失或延搁(延缓—悬搁 suspendre, suspension, suspens)感性认识获得理性认识提供了切入点。所以谓是所谓在观念上或在符号上的抽象,所谓是所以谓在客观上或在光线上的具体。所谓是可见的,永远是赤裸裸的物,还不能进入知识体系,有待看(凝视—瞥视、观察、直观),而所以谓是可述的,惟有可述(陈述)才能揭示言谈的客观性所谓,才能实现客观物的观念化或符号化,从而建立关于客观物的理论体系。只有对客观性所谓进行分析、诠释,才能使之成为观念的或符号的。当然,在实际的言谈中,所以谓之言谈(书写式言谈)与所谓之言谈(观看式言谈)之间的异同关系是相当复杂的。言谈所具有的这两个基本方面有助于我们挂失或延搁所谓而单独审视所以谓。“我们必须按照历史规律面对历史,必须面对关于论说(discours)的论说的长期耐性的构

成,也必须面对倾听已成的所以谓的任务。”可见,历史与历史、论说与论说、倾听与言谈不断重叠和展开,从而形成一种优美的褶子。很清楚,我们面对的任务将是阐明语言,返回到了语言自身,重叠和展开所生成的褶子也是语言自身的完美曲线。这种语言的自返活动和后果与以往有何不同?

从传统的观点看,言语(parole)的功能就是注释(commentaire,解说、注解、解释、说明、评论、述评、议论、回忆记录)。注释质疑的是关于“所谓”和“所谓谓”的论说,试图绽出言语的基础或实质,真理存在于此。福柯试图跨越传统的言语的注释功能的假设:所以谓有遗留、过剩,所指大于能指,正是本质的思想却作为残余而被延留(延遗、延滞)在言语的阴蔽处;言语无非是一种翻译、表达行为(注释行为),它在开口时也在沉默,在领取时也在挂失;因此,注释的任务无穷无尽、无法限定且不能完成:“总是存在一些拖欠下来的所指,这种所指应当发言,至于一直提供给我们的能指则丰富多彩,让我们探询它‘所谓谓’。”他力图延搁和避免注释的厄运,提出论说分析任务,这一任务与注释任务不同,言语不再仅仅是翻译行为(acte de traduction),更是论说实践(pratique de discours, pratique discursive)。论说实践是对翻译行为的超越、克服、化解、兼化和增补。“那么,论说事件不应当被视为一些多层涵义的自主核心,而应当被看做一些事件和功能片段,这些事件和功能片段逐步形成体系。陈述的意义不取决于它内含、绽露、保存的大量意向资源,而决定于将这个陈述和别的现实与可能的陈述链接起来的差异……因此,一种系统论说史有可能产生。”

这种论说史是一种没有语言的语言史,或者说,是没有语言的语言广告(陈述方式、宣传形式),犹如一幅没有泳衣的泳衣广

告(裸体广告)。传统的泳衣广告是让模特儿穿上漂亮的泳衣(泳衣外在式样或泳衣本身)以宣传和展示性感、健美、浪漫、爽夏、阳光与空气(这是泳衣的外部功能),如果对此构思加以改造,就会获得新而又新的效果:先让模特儿穿上泳衣去海滩进行日光浴,留下泳衣印(泳衣内部功能或内印所致),然后脱去泳衣,再让摄影师拍摄裸体照。广告中身着泳衣印的裸模其实并没有抛弃泳衣,只是以另一种形式把握着(穿着),而且将更能展现泳衣和模特儿的一切魅力,必能令人留下深刻印象。这难道不是一种有趣的创意吗?

这种创意同样存在于语言领域。泳衣与模特儿的亲和性关系可能移植到语言与事物的关联中。语言的注释功能——一直被视为语言的惟一功能或惟一形式,注释甚至也成为语言本身——相当于泳衣的外部功能,构成传统的语言与事物(或人)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常常容易被人们看见和接受。语言的论说功能相当于泳衣的内部功能(内印),在事物上刻印,构成语言与事物间的新关系,这种关系原来被注释形式遮蔽了;论说的出现把外在的注释形式抹(脱)去而展露语言内部功能所产生的印迹,即语言的论说印(内在形式)。这种带上论说印的事物并没有丢掉语言,而是在另一端暗示和保存了语言,并且更能展示语言和事物的一切秘密,更能看得见、感受得到和理解得到。说明白些,语言本有“注释”和“论说”两大基本功能,福柯试图对语言功能进行考古学还原,即把注释化语言的注释(替人说话的系统)夺去、挂失、框起来或括出去,即在注释化还原过程中得到论说(让人说话的系统),这是注释化的逆过程。他实现了从“替为关系”到“让为关系”的转变。语言因此而获得了另一条线索,即论说与其相应的历史语境对接,将语言导入实践领域,助人寻找